

1942年

第
第

16
17

卷
期

供施政參
報勿公開發表

20-21 26 28 32
16-20 23 27, 28

敵偽研究

16

版出日一月十年一十三 期六十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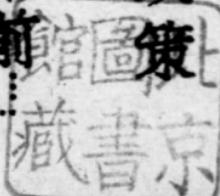
論日寇的海運政策

日本帝國主義沒落前

社會意識檢討

敵人眼中之汪逆偽政權

與「新國民運動」



浙西民族文化館敵偽研究室編印

通訊處 浙江天目山

論日寇的海運政策

在現代戰爭中的經濟意義上說，輸血式的運輸如何得能延續暢通，乃為爭取勝利的必要條件之一，自太平洋戰事發生以後，日本帝國主義本土與南洋間的連絡，由於軍事上與商業掠奪上的需要（目前特別是後者深感到迫切）。於是日寇的海運政策，便隨着「南洋貿易」，「南洋開發」高唱入雲了！

南洋是個多島國，像菲律賓濱就有七千〇八十三個小島，分佈在南洋羣島的東北部，荷屬東印度，也擁有大小二千多島嶼，在這許多島嶼間的許多港灣中，因為天然形勢的關係，決定了一般重噸大船不能在這些港灣中靠岸的事實。這情形頗與日寇國內相似，在日本本土除幾個大商業港口多數的港灣中，很少有幾個大船能靠岸的碼頭。

再則：在日寇過去的所謂都市工業集中主義，現下已為戰時現象所擊破，遂之「國防」和其他關係上的必要，國內的工業向各地方分散，便成為日寇當前的急務了。為適應這種分散，在海國的日本，建造一種在任何港灣能靠岸起貨的運輸工具，就成為必需克服的困難，如是，國內的需要，加上南洋間連絡的需要，終於大量建造一種三五千噸的特殊小型貨船的主張便應運而生了。據日本政論家中西友禮氏的意見：凡建造大型貨船一艘，需費時八月至十月，而建造一種五百噸適度的小型貨船，則在建造時日上可縮短不少，而這種小船在航海安全上，根據遠洋漁業水手等的經驗，大概乘一百廿噸至一百五十噸的漁船直下赤道之南捕魚，可無顛覆之虞。所以他認為使用五百噸的小型貨船担任日本與南洋間的連絡，深信可能在菲律賓濱以北，太平洋上，狂瀾怒濤中自由航行，如在船隊編制上，每隊以巨船一艘參於其間，以作保護之用，則航海中可無多大危險。再如石山賢吉氏等曾為這種小型貨船的安全設計，鼓勵日本國內科學家，學習納粹大會中受德意志最高名譽賞的：國民大眾車的建造計劃者保兒爾愛博士，要求極力設法解除航海時的危險。他還說在現時這個新時代裏，舊的英國型的船舶是不適用了，為了所謂現實客觀環境的需要，設立新的工場加工趕造，固不消說，如一般舊有的工場加以改造後適度的利用，這對於今後日本造船業生產噸量上是不可忽視的。

日寇自從海務院創設以來，就主掌計劃造船問題，過去日寇於閣議中所決定的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二）度物資動員計劃，生產力擴充計劃等上，有關造船資料和造船事業的就特別注意到，更在本年四月二十五日召集的第八十次臨時議會上提出了關於保障造船計劃的法律案，經過日寇的遞信省和企劃院等有關機關的研討，遂於五月十二日

定例開議上通過了一個大綱，這個大綱的內容，據第二日情報局透露出來消息，約略有如下幾點：

第一：關於標準型船舶的建造和現有船隻讓渡的基準價格，先由政府決定。

第二：政府保障營造團的利益，如遇因造船而損失之資金，該項損失概由政府補償之，同時由政府給予營造團在資金調達上以便利。

第三：概免接受承造船隻與機件之營造團的註冊稅。

第四：成立特別會計，處理營造事業。

以上是僅就日寇擬將建造特殊小型貨船而言，但是在這裏我們不能不注意這樣一個問題：即航海時日方面的經濟問題。日寇能否縮短航海時日而將這問題解決，這才是日寇海軍政策的基本課題。

記得英國首相邱吉爾在下院會談時說過：「一隻運輸船，在一年的新運時日中只要節約十天，那麼這一艘船，在一年中便可將五百萬噸的剩餘物資輸送完畢。」據專門家研究統計的結果知道船隻停泊在港灣的時日，多過於在海上航行的日數。如日寇的定期船，在海上航行四十七天，而在港灣的碼頭上却需留五十三日之多。這還是照一般情形而論的，如若不定期船隻，則更需時日了，在碼頭上留留的時日多過於航海日數，這種現象大部原因是在碼頭設備不良之故，那麼如何改良碼頭，如何全盤解決這問題，到目前為止，日寇却還沒有一個具體方案，以後如筆者能獲得這方面的資料，當再為文報導。

日本帝國主義沒落前社會意識檢討

(上)

——以敵國「東亞解放」雜誌輿論調查所得敵國各方面的意見爲藍本——

——活生生的史料，畫出敵國乾坤一擲（！）的悲劇——

——從客觀方面來看，這是敵國自身，由對內榨取，對外侵略的必然崩潰底過程——

——從主觀方面來看，這是敵國軍閥思想和封建思想，有意或無意地加速它崩潰的信號——

——這是歷史性的裁判，反映出敵國整個內部的哀鳴——

我們將儘量使用一些可畫的，而且比較現實的，屬於客觀的意識形態方面底資料，來說明日本帝國主義者，何以必須乾坤一擲地毫不吝嗇地將它自己粉碎在大陸的岩石上，和太平洋的浪花裏底所以然！這件割時代的而且絕無挽救餘地的歷史事件，如果不從日本帝國主義者本身去尋求它的因子，也許將使我們錯覺到敵國今日的自殺行動，爲拿破崙式英雄主義的復活；甚至使我們錯覺到敵國今日的毫無忌憚的侵略行動，爲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義舉，誠如目前敵人所竭力宣傳的所謂「東亞解放」，蒙蔽它的榨取侵略行爲。

日本帝國主義者，它目前以怎樣的一種姿態，出現並演出於世界的歷史舞台呢？可以說：

它在對內方面，是以封建性的軍閥獨裁政制，統治着敵國全體人民。並以此無上威權，榨取其全體人民底血汗與脂膏。且鞭笞其全體人民充作炮灰，作爲它少數資本家無底慾望的食糧，和無限再生產的犧牲品！

它在對外方面，是以軸心國的同盟之一，擲它最後的一點賭本，一面繼續侵略我國；一面發動對英美荷澳的太平洋大戰！他方面，因軍略關係，所以，目前仍對蘇聯保持武裝的中立。在對我的侵略戰中，尙利用漢奸偽組織，大作其不戰而屈我之美夢！

如果依常情說，日本帝國主義者今日竟將其國家和人民，置之四週皆敵的長期消耗大戰中，似這種毫無把握的孤注一擲的濫賭行爲，雖至愚之人，諒亦不敢蠢然出此。況其軍閥，素以取巧豪奪，精於打算，及善於權衡利害，著稱於世。那末，敵國的軍閥們及其御用的謀士們，縱不爲其自身地位計；退一萬步說，縱不爲其自身地位計；亦當爲其主子之資本家的利潤計。若然，方得謂之合乎常情。可是，敵國的軍閥們及其御用的謀士們，却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完全違背常情，幹出如上所說的「謀國不臧」底逆行來！似這樣，又將用何法去

解釋呢？

難道敵國的軍閥們，真正瘋狂了？

這是主觀的強調，非科學的看法，故不足以說明此等劃時代的歷史事件。

難道敵國的軍閥們，果真受了軸心國侵略領袖希特勒的指使和暗示？

這尤其是倒本爲末的看法，因爲首先侵略他國的，總起世界烽火，可是日本帝國主義者，而非德意志帝國主義者，故仍不足以說明敵國今日在世界政治舞臺上所扮演的角色。

難道敵國的軍閥們，是騎虎不能下背了嗎？

這是半是非非的看法，因爲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客觀的形勢上，確似騎虎；然在主觀的策略上，它可以不必騎虎，且更無虎背可下。故以騎虎之勢來說明敵國的現狀，尤未抓住問題的中心。

難道敵國的軍閥們，誠如九一八事變時，敵國前外相內田康哉所言，「吞下了炸彈」了嗎？

似這種自認爲強盜式的看法，只是一種結果的論斷；却並沒有涉及爲甚麼一定要吞下炸彈的必然原因，故仍不能說明敵國今日的自殺行爲。

難道敵國的軍閥們，在軍事上真能揚必勝之券嗎？

似這種直立作夢的假設，不僅三尺童子不敢相信；即彼素以剛復自用的敵國軍閥之流，亦絕對不會有此自信！單以敵國從九一八侵我以來，動員整個海陸空三軍，苦鬥十餘年，尙不能征服我國的鐵一般的事實，已足粉碎它軍事必勝的迷夢！今彼一旦突增如許強大敵對體，試問，它除了仰仗於神話中的人物，來拯救它的澈底失敗之外，是再也沒有第二法門了。故以軍事必勝一義，以說明敵國今日橫掃直衝的侵略暴行，尤非知者之論。

然則敵國的軍閥們，真如軸心強盜所倡言的生存空間底不夠，從而纔引起生死存亡的鬥爭嗎？

似這種欺世盜名的狂言，除了行兇者和幫兇者信（？）以爲真之外，凡稍具敵國及軸心國地理和領土智識的人，總不能不認爲所謂「生存空間底不夠」一語，是與妓女口頭上的「愛情」一言，爲等量齊觀的笑談！故如以上義來明敵國今日的豺狼之性，和虎豹之心，更屬透頂錯誤，澈底欺騙。

由此觀之，造成敵國今日狼奔豕突的現象的，一非瘋狂；二非希特勒所指使；三非騎虎之勢；四非吞下了炸彈；五非軍事上能操必勝之券；六非生存空間的不够。然則，究以何種因子，演進到它目前不可收拾的局面？

現在，我們再進一步檢討，日本帝國主義者，其所以演成今日必須對內軍事獨裁，對外軍事侵略，而將如太空

流星，勢非毀滅不可之概的，決非如上所論述的六種因子。因爲下列的六種因子，從其本質上檢討起來，並非因子，也不能成其爲因子；言之，只是一些主觀上的偶然性的現象和條件。偶一不察，頗易使我們錯覺，或迷惑！所以，我們必須破除以上所論述之似是而非的諸說；而另行尋出其決定性的與夫絕對客觀性的因素來，方不致於指鹿爲馬，涇渭不分。然則，既非上述六因，究竟是甚麼呢？

一言以蔽之，日本帝國主義者因內在和外在的雙重矛盾，已經發展到必然否定它自己的時候了！所以，縱使成它今日的不得不，不能不，和不可不走的陷阱和危岩！這是日本帝國自身的發展鐵則。

可是，話雖如此說，我們將以何種客觀事實，來印證來說明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經因內在和外在的雙重矛盾，發展到必然否定它自己的時候了呢？要解決這個問題，可從下述兩方面去理解：

一、從該國社會組織的下層基礎去檢討。所謂社會組織的下層基礎，即一國的經濟機構和生產關係。
一、從該國社會組織的上層建築去分析。所謂社會組織的上層建築，即一國的社會意識形態，或時代思潮。
以上兩者，是三物的兩面。在說明社會發展的階段時，自以兩面兼顧爲最合宜；反之，如因此重不同和篇幅限制之故，則專從一方面去說明，同樣可以反映出任何一國的社會發展階段，而不致迷惑。因此，本文爲了充分運用所有的資料，採取經者的方法——社會意識形態。

但此處尚有一點須申明的，即本文所採用的資料，係屬蘇德簽訂中立條約以前者。可是，如果站在歷史的立場來看的話，却愈足以顯示它底前因和後果；愈足以顯示它底非偶然性和非突然性；換言之，一種現象之發生，是必有其發生之先兆的。再則，任何史實都有其聯貫性，和不可分割性；反之，則必陷於孤立與分離，甚至歪曲事實，走入歧途。況本文的重心，原在「追述和因果兩大意義，是以，在本質和手法上，尤須乎具有歷史性的資料，作爲我們所要說明的對象之經。

現在，謹步入本題：

我們的命題，爲「日本帝國主義沒落前社會意識檢討」。故命題的本質，是特稱肯定式的。申言之，我們認爲日本帝國主義者，必定要「日薄崦嵫」，而且已到了日薄崦嵫之時！可是，我們有何種理由和根據，敢於如此斷定呢？此事已略述於前，不再贅述；茲此處所急欲檢討的，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在其日薄崦嵫的沒落之前底社會意識

敵國自近衛傀儡內閣第二次登台，和第三次局部改組，苟延殘喘以至東條軍閥登台止。（敵近衛第二次內閣，

自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起，至三十年七月十八日終，計十一個月另二十四天；第三次內閣，自三十年七月十八日起，至三十年十月十六日終，共計三個月二十八天。合計共一年另三個月又二十一天。此後，敵國軍閥纔圖窮匕見，率性自己登台，大有結束帝國生命之概！此即東條軍閥組織內閣，發動太平洋大戰的由來和近因。狹義一點說，這是日本帝國議會政治的喪鐘，反動的封建軍閥政治的抬頭！廣義一點說，這是日本帝國整個社會的新舊勢力，達到了對立的尖端，將要徹底變質的時候！所以，從歷史的立場來看，敵國近衛傀儡第二次和第三次內閣，這一年另三個月又二十一天的光景中，的確是敵國興、衰、存、亡的大關頭。從而，敵國此等大關頭之間，其整個社會意識的反映，尤其是我們檢討敵國必然命運和客觀現象之最珍貴的和最不可忽略的大時代。這就是我們所以必須提出敵國此時此際的社會意識，來檢討的所以然和絕對理由。

唯我們所要檢討的敵國沒落前的社會意識，是集中於政治的方面。不僅是集中於政治的方面，而且是集中於政治方面某幾項專門問題的意識之檢討。現在，謹依其性質的異同，分別詳述於次：

依據敵國「東亞解放」雜誌輿論調查檢討起來，它們會以三個現實的專門政治問題，反映出斯時——第二次及第三次近衛傀儡內閣之際——敵國底軍閥、財閥、政客、御用學者等輩的意識和夢想；客觀地說，敵國東亞解放雜誌會以下列三大問題，向敵國政界、財界、學界及其他各方面指導人物徵詢意見，藉資反映其國內多數之輿論。從而，以測知敵國日後的必然趨向和行動。所謂三大問題者，為：

(一) 對美國最近對軸心之攻勢，日本所應採取之具體方策。

(二) 如何推進結束中國事變方策？

(三) 對第七十六屆議會及其後之政情——尤其對近衛內閣——之直率的批判。

該雜誌對於上列三大問題答案的排列，是以收到先後為序的。我們為使其系統化起見，將他們每人的答案，分為三部分，依問題的先後，劃分範圍排列之。

(一) 關於敵國「對美國最近對軸心之攻勢，日本所應採取之具體方策」的答案，據陳於次：

衆議院議員平川松太郎——唯有斷然處之。(筆者按，所謂斷然處之者，即戰爭之謂)。

衆議院議員龜井貫一郎——強化軸心；日蘇調整；實行南進。(筆者按，目前敵國對外的政治軍事行動，幾乎與這位議員當時的答案，若合符節，其實，敵國今日的行動，就是當時社會意識的兌現。)

衆議院議員田川大吉郎——日本無干預歐洲事務之必要。惟專心於太平洋即可，蓋臥榻之旁，不容他人鼾睡也。

。應毅然獨往；惟其方法則至爲困難，此點政府當局應加考慮，吾人唯百默然是從，此即現政府所謂國論統一方針是（筆者按，這位議員的答案，除了顯明地表示對英美作戰的客觀意識外，還更強調軍閥獨裁的主觀意識。即該議員所特別指出的國論統一方針一語。）

衆議院議員尾崎行雄——目前應守中正不偏之地位。（筆者按，這位議員，是代表第一次大戰時敵國最流行的機會主義者。）

衆議院議員田中武雄——A、思念高度立憲國防之完成。B、戰略上應着英美合作攻勢之先鞭，對於作戰基點XXX，應堅取臨時可發之戰態。（筆者按，這位議員，已爲敵國軍閥的應聲蟲。）C、對於美國政治家之低劣的戰爭論可不予不睬。D、應與德國對美之戰策，不絕保持密切聯絡。

東日副主筆阿部賢一——最重要者，將國內政治、經濟體制置於戰時機權準備之中。（筆者按，這位副主筆的口調，無疑地是敵國軍閥的代言人；也可以說是當時敵國客觀意識的反映。）

衆議院議員田原春次——不外與德國協商，急速求荷印問題之對策，使美國認識東亞問題之自主性。爲此目的起見，應從速確立實行對美宜傳綱。（筆者按，這位議員已顯明地表示對南太平洋發動攻勢之意，但尙帶有巧取豪奪的傳統手法。）

天關打開期成會理事長瀨井佐吉——決心對美作戰，實行南進政策。（筆者按，這位理事長最能直率地表現敵國當時的意識，和今日的動向，爲一典型之軍閥的代言人。）

衆議院議員伊佐秀雄——A、應利用各種機會，開明日本之參加軸心同盟，非以美國爲對象。B、說明日本之南進政策爲日本之生存要求，日本並無武力進出之野心。（筆者按，這位議員，誠所謂爲掩耳盜鈴，欲蓋彌彰，矛盾百出之尤者。）C、整頓國內體制，冀在遇見美國經濟封鎖時，國內不致發生政治與經濟之混亂。

慶大教授永田清——一、二、兩項問題，（筆者按，第二項問題，爲「如何推進結束中國事變方策」者。）爲有關日本命運之最大事件，不便簡單作答。尤其因鄙人係政治外交的門外漢，更無資資解答。唯對於街頭巷尾之間，對此命運問題濫作無責任之議論，實不勝感嘆。鄙意僅認爲要非日本經濟強大，任何對外政策，不過空談耳。（筆者按，這位教授，因有幾分書癡氣，所以於實際的社會意識，不能謙然，致誤會他國內的客觀潮流之所趨，爲街頭巷尾之無責任的和濫發的議論，宜乎其不勝感嘆之至。）

庶民金庫名古屋支所長井關考確——所謂確立東亞共榮圈，具體言之，即係驅逐英美等格爾。撤克遜民族於

東亞之外，並阻止英美向地中海以東之進出。爲此目的之完成，應將新加坡、印度、荷屬東印度、菲律賓及澳洲等地，自英美支配權之下解放。（筆者按，這位支所長的宏論，恰好變成今日敵國軍閥在太平洋上，橫掃直衝的鐵則；換言之，敵國目前的軍事行動，是那時敵國普逼意識的成果。）

政治評論家山浦貫一——好狗不叫，對方所以吠吠不休，實是因爲沒有戰的自信心。如果我們也跟著一樣的吠吠不休，那就無異在說明自己對於戰爭的無自信心。至如其體的方策，應令其自己產生。

失名士——目前美國既無對軸心國作戰的決心，也無戰而勝利的把握。美國所想的，恐不出是和軸心國遙相對峙而自成一繁榮圈吧。所以，日本亦不必感情用事，儘可沉着鎮靜以應付一切是非。當然，對於意料不到的事，也是應該準備的。（筆者按，這位失名之士，雖在那兒斤斤較量對方的動向；但也是一邱之貉，在敵國整個戰爭潮流中浮沉。）

前衆議院議員齋藤隆夫——日美關係正在變化中。三國同盟以來尤然。此時而欲以和平論，正義道德之說，或大使的更迭及其他外交上的技術加以緩和，實屬大錯。解決問題，唯賴澈底之力。除賴我國國力以外無他道。首要者爲結集內部物、心變重之國力；至於由我而進，或待人之來，可委之最高當局之決斷。（筆者按，這位落選而被逐的議員，似乎已看到他國家對外的矛盾之不可挽救，只好在命定的輪縫裏，外強中乾地高叫着戰爭的來臨。此亦敵國社會意識之另一種的自我表現。）

文藝評論家古谷綱武——松岡外相在訪問柏林的車中談話中，曾謂：「吾人對美國無任何要求，儘其自由。美國亦應如吾人一樣，將亞洲的和平（？）委之日本。」這幾句話確是代表日本的心理。至如其體方策，希望加強三國同盟，而沿此路綫對於任何應力出之毅然無畏之態度。（筆者按，這位文藝評論家，雖則是政治經濟的門外漢，但的確如他所說，這幾句話確是代表日本的心理——日本帝國主義者現階段的必然心理。）

外交評論家清澤潤一——不以其爲對手爲首要。（筆者按，即不以美國爲對手之意。）近來日本「外交」太多，劍道中有：「鎮靜」一語。我想，我們漠視對方，看他怎樣。（筆者按，敵國的我行我素之昂然態度，有其客觀的因子，故成了它現階段的流行病。這位外交評論家，不過以應聲蟲的姿態表現之。）

軍事評論家福田恭助——就軸心國言，日本的責任是在西太平洋，所以只要不使美國在此方面取得攻勢就是了，若能使美國艦隊無能爲力，則尤佳。不過，現在對於艦隊本身我們不能有所作爲，只須監視艦隊的根據地即可。因爲這樣一來，就間接封鎖了美國艦隊的活動，而可獲得同樣的效果。具體的方法不便宜，僅從以上所述，即可明

白。(筆者按，這位軍事評論家，已經超越戰爭的意識，走上戰爭的行動了，可爲敵國今日在太平洋上瘋狂侵略的最佳的說明)。

陸軍少將歌人齋藤瀧——應該將日本的實力與決心，叫盲目的美國認識。結合樞軸之國力。整飭組織以應付美

國。
衆議院議員淺沼稻次郎——中國事變，不庸說是以容共抗日的蔣介石爲對手的，間接就是和援蔣之英美蘇等作戰。隨日德義軸心同盟成立而來之美國對軸心攻勢，我國早已有決定態度。一切處之以斷然的態度，爲使大東亞確保經濟自足自給起見，應先謀脫却對英美的經濟依存。(筆者按，這位議員的狂妄叫囂，十足地表示敵國共同的侵略意識)。

大每顧問井上吉次郎——美國的負責當局者既能任性言行，我國當事者自亦不妨直率表示。非常事者更可發表直率明白之意見。美國所揭櫫的擁護民主主義，我們得就正面加以粉碎，或暴露其主張只不過是假面具，主義與理論的爭論可姑置不論，至如實踐的美國的攻勢，在日本方面，我們信戰軍事當局。(筆者按，這位顧問，是相當地信任吠吠不休的宣傳戰的。可是，他與那位政評家山浦貫一的好狗不叫主義，互相矛盾。不過，却有一點是相同的，即必須戰爭一事)。

軍事評論家齋藤忠——不要再相信對方不會來，我們應該有待之來的警悟，這是最重要的。
女醫專校長吉岡彌生——節約並謀增加食糧，擴充生產，以期早日完成高唐國防國家體制，對政府及陸海軍絕

對傾軋，邁行一億一心，織域奉公，厥爲良策。(筆者按，這位醫專校長幹的是仁術，可是，却十足加一地主張反

仁術的戰爭。這自然是敵國現階段共同意識和時代潮流所促使)。
藤田勇——禁絕自國及英國殖民地的輸入，減少我國輸入額五成五分，並動自全力向他國先行導斷買賣，使我

國輸入總額趨於零化，及煽動(?)重慶積極抗戰以消耗我國，凡此種種，純係戰爭行爲，對付此種經濟攻擊，除

確保資源地以外實無他法(攻擊乃最善之防禦)；緩靖政策無異低首乞降。若事變無從連結束希望，則唯有縮短戰

綫，斷然南進。美國不一定合作戰。(筆者按，這位沒有標，身份的狂言家，除了充分表現敵國作戰意識和決心之外，還想以各個擊破的法則，來對付英美)。
京大名譽教授神戶正確——關於本國，不便貿然作答。(筆者按，這位名譽教授，也許不知如何作答；也許想

跳出敵國現階段的戰爭意識，而不便作答吧?)

富國徵兵重役伊豆凡夫——第一使美國知道日本並無野心，僅有光明正大（？）的「八紘一字」之意圖。對此固須外交部之努力，一方面亦可利用該國之親日人士，同時復作應付必要之準備。（筆者按，這是一邱之貉的外交，軍事雙管齊下主義）。

天來生——日本應取之方策，誰都明白，並無猶豫可言。但何時發動，却是問題。一般見解，認爲此點須視歐局之動向爲轉移。這種見解是不行的。今日日本的弱點，就在左顧右盼，而不直走大道（？）欲除去此種弱點，唯一策，即起用在野的強硬政治家。（筆者按，這位同樣沒有標出身份的狂者，不僅尖端地代表敵國對外侵略的作戰意識；而且，露骨地發出軍閥直接掌握敵國政權的信號）。

東亞新報社栗原一男一言以蔽之，立刻實行南進政策。當然，爲這一目的，應先整飭國內機構，策劃舉國民心歸一，以期集中於這一問題；就外交言，則爲立即調整對蘇關係，以防止分散實力於此方面。（筆者按，這位報人已赤裸裸地將今日敵國的行動：即對英美作戰，對蘇妥協的兩大國策，充分暴露無遺）。

衆議院議員倉元要——日本建設大東亞新秩序，與美國的遠東政策，是必然處於衝突的地位，而且美國本身的第一國防線就是中國，所以事實上已經在參戰了。現在，因爲找不到適當的藉口，尙未採取積極攻勢。若一旦獲得藉口，那就會大揮大東亞新秩序建設的台。日本在跳進火坑之前，一面處以耐心，以期趕到做到自給自足。或馬上就一刀兩斷。我國尙不乏親英美者流，此輩人需要頭腦冷靜一些。（筆者按，這位議員所論，因爲他要將跳進火坑的罪名，加到別人頭上，所以就不顧廉恥，歪曲事實，思以一手遮天下人之耳目。其實，他早就說到，「馬上就一刀兩斷」這樣先發制人的活了）。

伊藤忠商事會長伊藤忠兵衛——最後此事，無異教敵的手段，故以慎重發表爲宜。（筆者按，這位會長所言，無外乎軍事秘密，不可以示人。）

京城日報社社長御平洗辰確——確立不敗的姿態，爲一勞永逸解決美國的對日攻勢起見，吾人應先服彼方所信我國之弱點。即在我國產業力及資源獲得上確立不拔的地位。其必要措置如何，自無待言。（筆者按，這位居在高位的社長，也是一邱之貉的侵略者，不過，他想到他們底產業力和資源獲得的貧弱與困難時，就不免哀鳴了。）

中日實業會社社長高木陣郎——無！（筆者按，這位中日實業會社的社長，也許係居住在在我國淪陷區。故悉戰爭前途過於渺茫只好裝腔作勢，默無一言。）

慶大教授前原光雄——我國具體方策，應有積極的與消極的兩種。就中積極策關於美國在太平洋之進出，其防

衛方策厥在斷然獲得我國有力之作戰基地。唯此項積極策須有充分的準備與注意。目前所欲為者，乃致慮國力之現狀，審慎避免錯誤；其次消極策，係不過極平凡的常識，現狀應對英美作同等考慮，儘可能在經濟方面對英美作戰時準備，同時對外避免與英美以外各國發生磨擦，一面從側面協助德義以打倒英國。（筆者按，這位教授的答案，無論其為積極消極，不外急起作戰時準備，和戰略上的各個擊破之策。）

日本泰晤士社長鄉揆——美國的對日政策，此係將從政治與經濟變管齊下，期待從長期戰中獲得必勝。故我們的對策，亦唯有作此方面的反攻。即不論美國怎樣加重對日的政治與經濟的壓迫，若能事先準備到不受其影響，即美國亦無對日作戰的日實可借。強固國內，實行一億一心，擴充生產，確立東亞共榮圈內的自足自給，凡此，纔是日本永久生存之寶。（筆者按，這位社長所答，只預備守着既得贖物。沒有對美作戰的勇氣與把握。似這樣，在當時的敵國備戰狂中，算是鳳毛麟角了。然而，客觀環境，已將敵國推上了火山，雖有一二高見之士，亦不能挽既倒之狂瀾！）

金剛鑽主筆野崎龍七——要之，避免日美戰爭而同時投助德義，不過，今天也許不能够有今天以上的具體方案。蓋縱欲輸送德義以多量物資（？）又因西伯利亞鐵路運輸力有限，加之又非得封蘇聯當局的諒解不可。（筆者按，此明德尚未攻蘇。）因此，就目前言，對外唯有靜觀歐洲戰局的發展；對內迅速完成經濟各方面的準備，捨此而外，並無特別的辦法。（筆者按，這位主筆，是反映敵國的「計劃」主戰主義者。）

大每南京支局長村上剛——美國對於德義兩國之攻勢，姑置不論。但對於日本，她也開始了直接的經濟攻勢與三接假手重慶的武力攻勢了。三月下旬美國會警告過蔣介石（？）謂：如果逼迫共產黨（？）美國即承認共產黨政府為中國政府了（？）因此，橫阻將對共活黨的攻勢（？）這是事實（？）此事乍看來，雖很奇怪，但因爲若一掃共黨勢力，重慶即很易走向和平之路（？）所以，爲牽制重慶，繼續對日抗戰，也就不擇一切手段了。（筆者按，這位敵國支局長所言，誠屬謊言絕倫，古今無雙之狂妄者！本來，素以造謠惑衆者稱於世的敵國代言人，妄作流言，當是家常便飯，不足爲怪。）美國的國際信義，單看這一番，也便恍然大悟了。日本爲完成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本來使命，對於美國的意向，是不必太重視的。且須經常作應付萬一的準備，默然進行既定方針，則對於美就是大威脅。默然實行，是唯一對美的根本方策。（筆者按，以上所言，敵國侵略野心，已洞若觀火了。）

日本泰晤士鹿島守之助——強化日德義三國同盟，根本調聯日蘇國交。（筆者按，這位報人當時的答案，亦即今日敵國的國策。）

中國研究家米內山庸夫——乾坤一擲的態度，就個人言，也許是一大快舉；然而，對於國家，這種折橋過河（筆者按，折橋過河一語，與我國古語之破釜沉舟一義相若）的辦法，非出之絕對審慎不可。因此，個人當以死處事；於國家與民族，却不能絕對以死處之。苦增加惡思，必是有具體的方策產生。（筆者按，這位中國研究家所答，不愧為中流砥柱之譚論。然而，客觀條件，已決定敵國以死處之，個人主觀呀恩，何能挽其浩劫。）

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上對太忠——隨宋孔等親美派的活動，美對東亞的攻勢（？）最近傾見積極，重慶政府內部的人事更動，亦漸見親自派後誤之勢。全面和平的希望，似乎亦在大却中。欲美國了解日本在中國的自由活動（！）是比較困難的；但若出之中國民衆（？）的呼聲，則就是美國亦不容其不瞭解。這就是要求政府及國民外交陣更進一步努力的所以然。此時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考慮將美國自英國分離，而中國大眾則認爲美國不會從英國分離，同時，美國未曾自英國分離是事實，故此點非予克服不可。（筆者按，此乃一邱之終的各個擊破陰謀。）

衆議院議員高見之通——美國無論怎樣地瘋狂向我國進攻，其不能得乘一指，我們可由直覺感之。我方當進而攻擊彼方。現當儘量遣入潛美，並動員全部宗教力量佈及南美。南進有兩途，一爲沿中國海岸渡過海南島；二爲沿南北美大陸線前進。我人應兩者兼取，只進毋退。（筆者按，這位議員所答，可謂極盡侵略之能事。）

衆議院議員山元龜次郎——日本既積極向大亞細亞國策邁進，日美衝突即勢所難免。再者，其與軸心關係目前既爲絕對的，則其與軸心發生戰爭，亦爲宿命的命運。以此兩大要素爲前提，則除戰爭爲必然具體方策外無他。如此，日本應從速準備，遲則將逸天機。軸心對蘇聯之密切化有關最後命運。若不以戰爭爲前提之具體方策，則除消滅前述之兩大要素外，實無其他考案可言。（筆者按，這位議員所答，頗能予敵國內在的和外在的雙重矛盾，及敵國現階段，走上必然否定自身等客觀現象，以一針見血之論）。

東北帝大教授新明正道——美國對於軸心的攻勢態露骨，日本愈應該強化軸心的意識，堅抱隨而起的決心。美國不承認日本的新東亞秩序建設，事情已十分明瞭。對美國在那一點能夠找出妥協呢？對德義的義理姑且不論，但日美之間確無妥協的餘地。我們應得認清吾人已到外交具體政策的限界。（筆者按，這位教授所答，也是一邱之終的侵略狂。但其對客觀的認識，尚不及上列那位政客式的議員）。

大政翼贊會宣傳部山內藤介——除以日本經濟之現實性，強硬排斥美國攻勢之外，並無別法可言。軟弱之態，決不能止住美國對軸心的攻勢。而且，日本也決用不着對美國表示軟弱。（筆者按，這位大政翼贊會宣傳員所答的，以敵國經濟，強硬排斥美國攻勢一策，誠爲以卵擊石之談）。

實業家森平兵衛——倘若無人之美國國際干涉政策，幾可謂業已參戰，惟尚未正式開始，我國當予以嚴密監視，堅持覺悟以應付萬一之變；我國與軸心國締之目的，本為建設世界和平（？）故當防止一些危害人類及其文化之戰爭的爆發，以期完成東亞新秩序。其次，中國事務及大東亞共榮圈之新秩序的建設，我國當使對方瞭解八紘一宇精神之真正意義，俾促其反省。（筆者按，這位實業家，竟以外交家及代言人的姿態，強詞奪理和歪曲事實地大放厥詞，以期嫁罪於人）。

衆議院議員前川正一——一部分財界之反對日美對立的傾向，縱有三國同盟之成立與國策之確定，似仍頗執拗。日本的決心態度未見之具體化於東亞以外，對於此事似亦多少有些關係。具體強化三國同盟，尤其應當明白解釋第二條的意義，即「在受攻擊的時候」。同時使國民對此亦具充分的理解；日本的南進，是不可避免的。（筆者按，這位作為新興財閥代言人的議員，為要實踐其後來居上的野心，竟對舊有財閥，體無完膚地攻擊，罵他們背叛國策）！

評論家秋澤修三——最重要者，與蘇聯成立友好互不侵略關係。其次對於美國問題，唯日本的主力如何為依歸。一面沿三國同盟之綫而推進東亞共榮圈之建立，同時，復欲避免日美戰爭，是非常困難的，現在幾乎成了不可能的地步。但若果現在實質放棄為建設東亞新秩序的鬥爭，或延期之於遙遠的將來，則現在縱不馬上廢棄三國條約，亦應力避日美戰爭，日本主體條件的如何，是去採途徑的要點，唯目前日本並不軟弱。故現在必要的是對東亞解放（？）採取漸進主義，以觀歐局之進展而坐守時機。（筆者按，這位評論家的主觀漸進主義，怎能抵擋得住敵國客觀的急進主義呢。所以，他的答案，是被敵國的全能侵略意識所否定）。

婦女界社長都和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火鐘，是發聲猛烈了。現在，實際已參戰的美國，名義上尚沒有參戰。日本對於如此情況下的美國的方策，不外應抱有行動的決心。吾人能有具體的方策，僅絕對信賴局即可。（筆者按，這位社長亦是軍閥的應聲蟲，一邱之貉的戰爭狂者）。

經濟評論家岩崎英器——外交方面確立對蘇關係。政治方面再加強體制的姿勢。經濟方面脫却對美的依存。最後一點，單單跨口東亞共榮圈之自給自足，尚不足解決。唯有賴日本產業之新合理化運動（？）期生產性之向上（？）始克有為，（筆者按，這位資本求末的統制經濟的評論家，衷誠效勞地思變更育的和無政府狀態的初期資本主義經濟機構，為獨佔的法西斯資本主義經濟機構，期以實現其高度的國防政策，進而加強其軍閥獨裁政治與政權，以便敵國的乾坤一擲！然此亦為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展的必然過程。）

不知火生——飲制彼此死命是難的，尤其欲制日本死命更難，故今日不如避免日美戰爭。且我們不可防其不來，而倒應該有待其來的決心。若美國因參戰而耗竭國力，那就是我們實行南進政策的好機會了。又若英國操勝算而不必要再顧忌德國的時候，則美國對於東亞共榮圈的反對，亦勢必趨於積極化，這是我們不可不防備的。（筆者按，這位的答按，可以說是敵國侵略主義底陰暗面，是阿Q精神的自然表現。）

京城大學教授森谷克己——最重要者為內部鞏固，確保南方自給圈以策萬全。即對內促一億一心之新體制，對外先固守北方，然後向南確保為建設東亞自給所不可或缺的南方圈。完成萬無一失的佈局，此為萬全之策。（筆者按，這位教授所答，完全是一套舊式帝國主義者侵略領土，奪取資源的狹狹面貌。故其戰爭意識，可與其軍閥等量齊觀。）

政治評論家竹尾式——松岡外相，有人責其對美態度過於軟弱。美國對於軸心攻勢，日本當然不得加以默視，不過為抑止此種攻勢現見，並不是說對方強硬，我亦報之強硬。美國現在正在興奮中，已經失去理性。對於此種興奮狀態中的美，若再予以刺激，殊非得策。美國人含有一種過份解釋的習性。我們應該取之以冷靜，使他充分瞭解我們的意向。這也許是不會有甚麼效果的。然一味使其興奮，亦無非徒增事態的紛擾而已。美國是一個受輿論支配的國家。美國人的心理業已反日，這可以說是日美互鬥的一大原因。我們應當發動輿論，使美國輿論逐漸親日化的目標，是在和平（？）而非戰爭（？）（筆者按，這位所謂政評家的所答，真是極盡一石擊三鳥之能事。須知入類的聰明與政治謀略，大致相差不遠，不會你之所為，別人完全不知之理。則此種小技，用之於今日的國際，欲其發生效果幾如挾秦以超北海。）

文藝評論家淺野晃——應堅制荷印。

北日本新聞顧問島基智三——此時最忌的是徒然騷擾。（如前年的排英運動然）我們應該泰然準備，以防最惡的時候之來臨。其次重要的是強化軸心，整備對內諸策，就中生產力的擴充，尤關重要。而南進政策的實行，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日本經濟自南方發展，可說對美的仰向鼻息。（筆者按，這位顧問所答，亦係一邱之貉的侵略主義。）

評論家田中惣五郎——不必用甚麼藉口，捨老老實實前進以外無他。以經濟力壓迫軸心國的美國方策，對於未賦天惠的國家，是一種束縛，對抗的方法，除武力以外無他。武力與經濟力雖然不可分離，但經濟力未必就是武力。

。在武力勝於經濟力的日本，只有採取武力一途。我們難道低頭不成？外交雖非如兒童吵架那麼簡單，但頗能處之昂然就是。（筆者按，這位評論家的所答，誠屬言今獨步的侵略意識之登峯造極的表現。）

實業家三神駿吉——因日德義三國同盟的訂結，日本參加建設（？）世界新秩序的步驟，是已經決定了的。美國聲稱倫敦和重慶是她的第一條國防綫。日美關係的現況，是在一路驚進之中。因此，錢後國民最重要任務，即是所謂擴張再生產，吾人爲急速自救自足自給經濟，並高度國防國家起見，不許有任何躊躇的事了。此後當以至誠率公之心，集中力量以圖資本，技術，與勞力的結合。同時，我國對東亞共榮圈的指導力的伸張，亦有關於我國國運，一切妨害應斷然予以排斥。根據當真的確立舉國一致的國防體制，以及反共、和平，以解決中國事變，以確保南洋資源，纔是克服美國野心與攻擊的關鍵。（筆者按，這位實業家，一方面榨取其人民的膏血；一方面又須其人民作砲灰，以確保及奪取海外資源。）

日產汽船專務小田桐治忠——日本對美的關係，應在不即不離的立場，儘可能予以外交的處理。（筆者按，這個答案，不合敵國現階段的侵略狂潮，當然被否定。）

以上所述，是敵國各級人員，在敵國挑動太平洋戰爭前一年，敵近衛德儼內閣第二度與第三度之間，所作「對美國最近對軸心之攻勢，日本所應採取之具體方策」的答案。一言以蔽之，他們對於這個現實問題的處理，除了以乾坤一擲的自殺態度，和賭國運的流氓行動，斷然出之以武力攻擊之外，他們不知有其他道了！雖然，敵國發展宿命如此，也就無話可說了。（下期續完）

敵人眼中之汪逆偽政權與「新國民運動」

——原名「強化國民政府與新國民運動」——

本文作者日人岩井英一，事於汪逆偽組織，對汪偽內情及敵汪間之關係，瞭解殊深，本文目的雖為求促進「解決事變」之實現，然其對敵偽關於「處理」中國問題直率的指摘，出於日人筆下者殊屬少見。其中特別值得注意者，即：（一）對每次國際情勢之劇變，敵國當局未有適當之對策；同時亦未舉其全力積極處理「事變」。在日本國內，大多數人對於「中國事變」的處理，甚小關心，承認解決「中國事變」的困難性。（二）敵偽矛盾的尖銳化。汪偽自「還都組府」迄今二年間，尙未能副衆望，因即敵人對汪偽發生了失望觀，遂漸喪失扶有汪逆偽組織的意旨；反之，敵人所加於汪逆偽組織的嚴厲的束縛，引起偽方深刻之反感，甚至有「和平抗日」論調之發生。敵偽之矛盾已達嚴重階段。（三）汪逆偽組織之內部，至今對「和平運動」仍缺少堅決的信念，對觀日的信念仍不充分，相反，尙有依存英美的思想出現，機會主義的觀念「尙普遍存在於汪逆偽組織的內部」。其次，奸逆羣相互間傾軋排擠，自私自利主義與生活之腐敗等等。凡此種種，致未能得到民衆的積極擁護，陷於「開店休業」的困境。關於今後汪逆偽組織是否可以得到強化發展，誠如岩井英一所言，「却又未必能斷言可卜順利，且有向反對方向逆走的危險」。夫敵人對我軍事進攻失敗後，扶有汪逆偽組織爲其「解決事變」的唯一方策。茲敵汪之內幕既復如此，故不論敵人目前如何着手「強化」汪逆偽組織，上述諸矛盾如無法加以克服，敵人利用汪逆的失敗，便可不言而喻。此外，國際局勢的變化，對於汪逆偽組織所發生的影響，也值得我們重視。最後，敵汪期以實踐「新國民運動」掃除敵偽間內在障礙，亦堪我們予以重大的注意。

本文係於汪偽「還都組府」二週年所發表，特將全文轉載，以供參攷。
註：國民政府——指汪逆偽組織

自汪精衛氏毅然實行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後，爲時已倏忽二載。其間國際風雲的變化，幾有一日千里之勢。自去

夏德蘇戰爭出人意料之外爆發以來，第二次歐洲大戰的內情，遂亦愈臻複雜，其最顯著的结果，即美國參加歐戰的傾向日益濃厚，而他方面日本與德意軸心的結合，亦愈緊密；因此大部份世人即將日德義的軸心羣與英美等反軸心羣，分爲兩大陣營，而兩方的對立，亦愈見確定，由於兩大陣營對立的日見尖銳化，英美竟圖起而阻止日本參加軸心戰陣，並圖妨害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尤其是美國，對日本採取壓迫態度最烈，不僅實施經濟壓迫，且更勾結英荷澳等，圖加軍事壓迫，對於重慶的援助，亦日益積極露骨。由於此種情勢，日本爲貫徹其保衛東亞的神聖戰爭的目的，遂即興師討伐英美，於是大東亞戰爭遂告勃發。

南京國民政府之成立，原爲適應日本處理事變的國策，以期完成全面和平，進而協助日本建設大東亞新秩序；同時，不願蔣介石之繼續無意義的抗戰，大深渴望和平的心理日益高漲，故國府還都，原求以副衆望。因此，國民政府之發展強化，不僅有待於政府構成份子之本身努力，且亦當積極使民衆參加並謀日本之全力支持，蓋此兩大支柱，乃爲絕對不可缺的根本條件。然而，在還都以來二年間，雖有表面上之國府機構調整，中日基本條約之計結，及三億圓借款等等，惟國府之發展，縱未得言貧弱，但坦白言之，亦不無缺憾之處。又在大東亞戰爭爆發之後，重慶政權已陷絕望深淵，故國民政府實處於極有利的客觀形勢，然而今後國民政府之發展強化，却又未必能斷言可卜順利。極言之，且有向反對方向逆走趨勢的危險。

其故又安在？蓋如前述，對國際情勢之目迷五色的割變，未有適宜之對策，同時日本未得舉其全力以積極處理中國事變，亦爲不可否認者。再者，和平傾向之民衆，因鑒於撲朔迷離之事勢，未得適當歸趨，遂亦喪失其對國民政府積極協力的勇氣；凡此均爲不能掩飾之事實。然則，問題的關鍵，實言之，豈不在國民政府之內部自身乎？總之，此種事態，無論就國民政府之成長言，就中日雙方言，均爲不幸；惟余對於汪主席所處之困難環境，及其不屈不撓繼續奮鬥之勇氣與努力，殊表敬意。

自前年近衛聲明以來，日本即協助以汪氏爲領袖之國民政府改組及其還都，且以誠意訂結中日基本條約；其間雖有若干異議，惟始終堅持不以蔣介石爲對手，事變處理，仍一貫以汪氏爲首之國民政府爲對象，此種國策，堅決不變。然而，我國（指日本下同）如此誠意之國策，其未得充分作事實之發揮者，其故又安在？且大東亞戰爭爆發後，東亞形勢絕對有利於日本，英美勢力之敗退，已無疑義，而其自然結果，當爲日本處理事變之方針更見明確化。然而，國府支持的方策，依舊未見積極，原因究竟若何？再者，不僅和平區內的民衆，就是抗戰區內的民衆，甚至抗戰陣營內的當局自身，對於盲目抗戰建國的理論，自大東亞戰爭以事實演出之後，亦覺其不能存在，則何故

尚不龍把握民心？

有人說，這責任是在日本。然而暫置日本的責任於不論，秉承責人以寬，責己以嚴，東方固有美德，余願表示接受此種言論的雅量。惟余願申言者，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國民政府內部。

今天中日事變已發展為大東亞戰爭，其性格亦已一變，我國已起而從事亞細亞的解放戰爭。有人認為亞細亞戰爭解決後，中日事變可望即速解決。在日本國內，除有心識者之外，確亦不無對中國事變的處理，有較少關心的傾向，其原因一因中國事變解決的困難性，一因國平政府的發展，若不能副豫期所望，終於不能成就大業，成爲一個有力的協助者，因而發生了失望觀。然而，對於東亞解放戰爭最重要的，是中日日的協力，而就中日全面合作言，也即就完成中日和平言，客觀情勢再無如今日般成熟者。因此，若使失去今日良好機會，不僅將遲延亞細亞解放之實現與東亞共榮圈之建設，且將造成對後世子孫百端莫辭的恥辱。

協助強化國民政府一事之爲日本處理中國事變之根本國策，已日益明確。余亦深信爲從速解決中國事變起見，除速行強化國民政府之外，殊無他途。現根據此項國策所示，及余個人之信念，願對過去國民政府發展強化所以遲的原因，以及對國民政府的內部問題，作一檢討，並研究具改正的方法。再者，時爲強化國民政府起而付之實行的新國民運動，余亦願以完全個人的立場，對余所敬愛的國府諸公，略資貢獻。

一

強化國民政府的兩大支柱，如前所述，爲日本方面的全力支持和平民衆的積極擁護。不過，這兩大支柱間是保有相互關係的即若不得日本的全力支持，就不容易獲得和平民衆的積極擁護，換言之，即不易把握民心；而爲獲得日本的全力支持，唯能把握民心的政府能爲之。而此二大支柱的能否獲得，其關鍵就在國民政府的內部，國民政府的發展強化，因未得日本方面的全力支持，及並未能把握民心，故在過去二年中未必能言順利。其主要理由，如余所指述者，端在國民政府的內部。以下所論各點，雖非其全部，然均爲妨害國民政府之主要障礙所在。

一、對和平信念的缺乏堅決

要之，民衆都是大勢順應主義者。民衆縱極希望和平，但和平目的的完成，及其力量的積極結合，並不能全托諸民衆本身，而非有指導者加以鞭策不可。換言之，就是應該把握和平區進而把握全中國的民心，加以組織之，爲完成和平的目的起見，結合其力量，故不得不待南京國民政府的指導。然而，欲爲指導民衆的指導者，非懷有堅決

不動，始終一貫的和平信念不可。然今日國民政府諸公及關係當局，果具有不拔之和平信念乎？誠然，當諸公脫離危地，奠定和平基礎，實行改組還都之際，確具有無可懷疑的信念與熱情，然在今日仍強行當初熱熾和平信念者，果有幾人？

我曾聽說在國民政府中，有人因實現和平遲遲未成，不圖深自反省，反歸其責任於日本，而致有「和平抗日」說的發見。又聽說有人因遭遇困難，或因失望，遽即表示辭職。諸此現象，要言之，不外由於未曾瞭解和平運動，較之抗戰尤為困難，蓋因和平運動乃一不輸於國民革命的重大事業。良以和平運動內欲自中日戰爭中求國家之獨立，外欲求解脫百年來歐美國主義之束縛，冀得參與東亞新秩序與共榮團的建設，故與單以打倒滿清，以建設中華民國為務之辛亥革命相較，尤為重大艱難，故決非一朝一夕得而成功。其進行亦決不能絕無阻礙，從而非有百折不撓之勇氣與確乎不動之信心不可。關於此點，余對於汪主席之極大信念，毫無疑慮，汪主席在大東亞戰爭爆發當日所發表的聲明中，業將東亞戰爭的意義闡發無遺，其中有言謂，中國為完成共和平目的起見，非與日本一同甘共苦不可，又主席在「新國民運動與精神總動員」的廣播中（本年元旦），曾謂：「我們要知道在大東亞的長期戰爭中，不必問將來怎樣共甘，只要問現在怎樣同苦」，這種言論，無論就那方面看，都表示了認識的澈底與信念的堅決，是值得感佩的。我們同樣可以相信，主席領導下的幹部中，亦必具有同樣的心理。不過一般說來，認識不足與信念薄弱者的存在，也是不可否認的結果。遂有因一時困難而遽即動搖其對和平的信念，因此而陷於失却日本的全力支持，與不能把握民心的窘境。

二、對日本合作，即澈底親日信念的不充分

如前述因對日本不滿，而有「和平抗日」的議論者，其對和平信念的不夠，固無待論，同時對於中日合作的信心，亦甚欠缺。然而國民政府改組還都的目標，本出於反省中日事變的錯誤，故欲求自抗日政策轉向親日政策，即由中日合作樹立中日新關係，以中日的協力進而建設東亞新秩序，可是現在却有人因政府事務，進行不盡如意，而將責任歸諸日本，玩弄「和平抗日」的論調，殊屬可憾。究其原因，不外因鑒於國際情勢光怪陸離，以和平手段建立中日新關係的工作，亦受影響，而對日本強化國民政府的努力與真意，亦未盡理解所致。誠然，也許有人會責難中日基本條約所規定的約束，並未完全實現。此種非難，固不無一部份理由，然而如能易身處地，為日本所處的立場一加考慮，則定能發見此乃戰時所不可避免的現象。凡此理解缺乏，遂加非難者，均尚缺如汪主席所謂之共甘同

苦之精神與罪己精神。此種比重慶之武力抗日思想尤為惡化之和平抗日思想，實由對中日合作信念不足之故。

要之，重慶政府固不論，就在國民政府的內部，保存英美的思想，尙未完全清算盡絕，同時對於日本的實力，亦未有充分認識，所以才有上面所述的現象發生。實則日本的實力，在這次大東亞戰爭的爆發時期，即已發揮無遺。日本的物力，壓根兒推翻了英美的估計，而其舉世無匹的精神力量，尤使今日全世界發生莫大驚異。日本如此偉大的實力，既已擺在吾人眼前，則依賴英美或依賴蘇聯的思想，理應一掃而空，然事實上，未必盡然。在大東亞戰爭爆發之前，當時日美危機驟傳，有若干和平運動的關係人物，深慮戰爭爆發，竟私下將法幣掉換美金。此種行為，與後面將述及的中國民族的惡習和自私自利的思想，實不無關係。而此種行為，一旦傳至有心的日本人，就免對和平政府對日本的真正意向發生懷疑，從而對於政府的既定國策，就不免動搖其積極協力之心。

還有一部份人，雖看到大東亞戰爭開戰之後，英美即遭遇了決定性的失敗，可是仍不免懷疑在長期戰爭的場合，或在反軸心的蘇聯出面參戰的場合，也許日本將陷於腹背受敵的艱境。況且中國事變又未解決，因而這輩人心裏竟想象最後勝利也許會屬之反軸心羣。此種謬想，而竟存在以中日澈底合作相標榜的國民政府內部，誠可謂不幸之至。這種冷淡的對日觀念，其不能獲得日本全力支持，實不難想像。俱幸而汪主席始終懷有確切的認識，在大東亞戰爭爆發同時，為適應東亞新事態起見，汪主席即宣揚同甘共苦的精神。其在對國民的廣播中，力言：（一）治安之確立，（二）軍事力量之加強，（三）增加生產與節約消費等的必要，以為在東亞解放戰爭中國政府與日本協力的指導方針。余對汪主席之信心不啻一點仍欲加以指摘者，無非因事關國民政府關係者之心理問題。如諸位所已知道的，日本自中日事變發生以來，全國朝野上下，為貫徹事變目的起見，國民個人的自由，曾受極大限制。甚至衣食住各項日常生活，亦莫不受有限制。然而，國民並不認為這是犧牲，而是認為奉侍國家所應有義務。譬如衣服，裝飾品，食物等等，凡近乎奢侈的，都一概目為「奢侈是敵人」，一切寶石和貴金屬，均獻之國家或由政府收買，而絕不留作自用。又如食物，亦規定有最低價格，雖不免有多少例外，但大體上都是嚴格執行的。若根據汪主席的困苦精神，則國民政府治下的實情，亦理應做到如此。可是事實又如何？大東亞戰爭爆發後，汪主席首先倡導限制宴會的碟數，這當然是出於主席所說的與日本同苦精神及節約消費的旨趣。如果汪主席的心意能達到普及徹底，還就有了日本的人生意義的一種性格了，從而國民政府之強化得獲日本的全力支持，是無用憂慮的。可是汪主席的心意，並未普及其周圍人物，譬如據說碟數雖然減少，每一碟菜的份量卻增加了。這種事情，雖極細微，不過其

影響却極微妙。再有值得注意的，是衣飾類：，有如前述，日本爲完成中國事變，完成大東亞戰爭並確立大東亞共榮圈起見，不惜犧牲一切以求最後勝利。寶石，貴金屬等等，是完全不加使用的。遑觀國民政府關係者，金鑽金錶等固不必說，更有不少人身佩寶石以示闊綽者，如此人物，又豈得謂瞭解汪主席的「同甘共苦精神」？又孰能謂真能貫徹中日協作的精神？最後，國民政府關係者的這生活態度，對於歷受戰爭痛苦而渴望和平的民衆，又焉能其對政府之積極協力？

三、自私自利主義與機會主義觀念的未盡肅清

任何人，對於汪主席冒生命危險，脫離重慶，投身和平運動的捨己精神與大公無私的態度，以及其獻身民族國家的誠意，都是絕無懷疑的。世人中往往有就汪主席過去的政歷而加以種種批評者，不過，我們要知道任何人總不免有成敗的缺點，所以我也不想爲汪主席的全部過去多作辯護，惟和平運動開始以來汪主席的大公無私的誠意，確是無可疑的。蓋汪主席過去既爲國家最高地位的人物，謂其今日爲名譽地位金錢而不惜冒生命之危險者，實乃不能想像者。

然而，自私自利的觀念，仍不失爲中國民族性的一大弱點。余愛國，亦一如愛余之祖國，故余之作此語，決非出於毀謗中國民族，余對中國民族的優點，亦頗有認識，惟爲本文之目的，在於批評而非在於贊揚，故僅願就其弱點加以指正，以之爲強化國民政府之貢獻，進而推動中日事變的全面解決。所以希望讀者能悟覺余意而不予曲解。余所尊敬之袁殊氏，就是能瞭解中國民族的劣勢而奮起加以糾正的一人。過去蔣介石氏，亦曾認爲欲求民族復興，必以打破民族陋習爲先決問題，而實行過新生活運動。再者，目前和平區域最優秀的政治雜誌「政治月刊」，曾於最近二月號中刊登徐震氏之文，題名「如何推進新國民運動」，將中國民族性的弱點，坦白加以指陳，所以余雖不免有失禮之處，然余之指摘中國民族性的弱點，決非出於誹謗，此乃願意慎重聲明者。

汪主席對於和平運動的意向，在主席迭次所發表的言論與文章中，可以見到，且余更從日常得與主席接觸的先輩友人處，略悉主席的種種，衷心異常感服。不過在多數參加和平運動者間，却也不乏自私自利與機會主義者，這就形成了獲得日本全面支持的妨礙，與把握民心障礙的原因。此種事態，實屬異常重要。現在且就余日常見聞所得的實例，爰作具體的指摘如后。

(1) 在中國，發財的第一捷徑，據說叫做官或做軍人。而在國民政府的場合，此升官發財的習慣，亦爲一般

非難的中心。然而，改組還都的國民政府，除了負有中日空前悲劇中所產生的建設新中國的任務外，同時亦負有與日本合作建設東亞新秩序的重任，換言之，國民政府是一負有超革命任務的政府。再者，因中日事變而使民衆所蒙受的痛苦，較之從來的任何戰爭，任何內戰，尤爲重大深刻；因此，爲完成這樣的空前大任務，並解救民衆的空前大痛苦起見，非有普通決心以上的決心不可。即縱令不能行堯舜禹湯的善政，至少亦應實行比重慶與延安爲上的政策。換言之，要以大公無私的至誠以行政治，則不能脫離今日所處的困境；假令縱一時不能充分對日本協力，不能使民衆安居樂業，亦應令日本瞭解其誠意而予全力支持，使民衆得以心服。今日一般識者固無論，就是民衆，也曉得和平與抗戰孰爲國家民族的利益，即除抱有野心的中國共產黨外，四萬萬民衆幾無不渴望和平，問題只在爲政者是否能拋却私心而認真爲國家民族奮鬥。然則誠一觀國民政府的現狀，能抱大公無私精神者果有幾人？不曰某某買金條而發財，即曰某人以剝削民衆而致莫大財富，或謂某項工作，可致富百萬，或謂某人與賭場相勾結，腰纏十萬，又曰某某軍隊之改編費數十萬元，其中一半爲銀行私人存款，另一半在南京購地造屋，凡此種種，均爲世人對於國民政府之概觀。余個人對於此種世人非難，是否確實，固難加以確認，然亦並無加以否認的材料。要之，此種觀念，縱曰「空穴來風」，惟對國民政府則爲不幸，蓋此種批評一日傳至日本，日本方面當不免意其支持國民政府之心，而其傳至民衆，亦不免使和平份子失去積極擁護國民政府的勇氣。據聞國民政府對於中日基本條約中所規定的歸還項，係責難日本缺少實行的誠意，惟此事須先求國民政府方面的自省，實爲不容否認者。

(2) 黨同伐異，作弊過多。在中國政治經濟及其他部門的事務關係，誠極微妙，這在國民政府也未能例外。在事變前的蔣介石政府中，甚至在以團結堅固相誇稱的中共內部中，也有所謂留蘇派與志幹部派的對立存在，所以國民政府的有此現象，亦不足爲奇。不過國民政府改組還都，爲日尚淺，新中國的建設，亦方踏進一步，故此際所最重者，應求政府內部的團結一致，以向和平建國途上邁進，斷乎不能有人事關係的糾紛。可是究之實際，對立分裂，明爭私鬥的事件却也不少。當國民政府改組還都之際，本以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團結合作爲前提，惟在還都後，每逢實際政治的運用時，政府構成馬上暴露了其一元化性格的缺如而使強力政治的實行爲不可，逐漸次變成國民黨中心主義，以東亞聯盟運動爲契機，殆乎還元成爲國民黨的獨裁了。就處於極端困難環境而又負有空前大任務的國民政府言，爲強化其政治力起見，其如此發展，也許是正常的。然而國民黨的構成份子既無多大變化，對新任務就缺少新的精神，是故各黨各派解消後的國民黨，與過去的國民黨並無何等不同，分裂對立，黨內結黨的弊害遂層見迭出。爲爭奪黨內將來領導權的暗鬥，姑置不論，而如爲強化國民政府而結合成的東亞聯盟運動，

亦充斥了黨同伐異的氣象。日本對於本運動態度的欠明朗，固亦不無原因，惟爲獲取地位的機會主義者從中作祟，實爲最大妨礙，所以成立至今雖已一年有餘，但除廣東那種有特殊事情的地方外，在中央本身，簡直等於閉店休業，毫無積極活動。此或黨同伐異的弊害，結果遂使和平民衆遠離，使日本方面不能予以全面的援助。

(3) 門戶封鎖主義太強。對於國民政府，目前內外所最痛感的，是其人材的缺少，人的資源的貧困。所謂人材，不是指過去的閥閥，聲望，地位等問題，雖然即在諸此各點上，亦深感不夠。惟爲國民政府之健全發展起見，諸凡法律規則，各種機構設施的整飭，實有萬分必要。而其運用，則端在於人。所以國民政府爲求發展強化，人材吸收與人的資源獲得問題，實屬異常重要。然則目前國民政府豈不有門戶封鎖過強的傾向？此種傾向，既妨礙和平區內人材的吸收與人的資源的開發，亦爲阻止重慶陣營參加和平政府的原因，引而伸之，亦爲不能招致民心的理由，同時使日本發生悲觀印象，結果遂不能獲得其全面的支持。其間原因，不外因爲國民政府當局對民族的利益與強化政府本身問題未能着重，而只求鞏固一黨一派，即由於利己的思考所致。

(4) 閉塞下意上述之路。凡大事業的指導者，必須具有不惑於甘言蜜語，不畏苦口良言的雅量。最後的決斷，雖出於指導者的抉擇，惟亦得接受別人的忠言，簡言之，即集合衆智，以行政治，始得謂得民心的善政。然現下國民政府雖在形式上汪主席一元統制黨、政、軍，惟實際上則汪主席地位，頗有日漸昇華化爲偶像的傾向。一般政治，亦每少逆耳忠言，而有阿諛之詞的現象。因是使汪主席對於內部的情形，頗有欠缺明瞭認識之處，然此點却爲名實俱全的指導者所必要。這種使下意不得上達於汪主席周圍的現象，亦爲妨礙把握和平民衆心理的原因之一。要之，使願參加和平政府的民衆態度趨於消極，此種消極份子，間接直接向各方面表示批評，結果亦即不能獲得日本的全面援助。

三

爲文至此，想到汪主席所提倡的新國民運動。新國民運動的意義與內容，已盡在去年四中全會的宣言，及汪主席的迭次聲明談話並其手諭所示的綱要中。在四中全會宣言中，曾謂：「新國民運動爲和平反共建國的唯一出路」，又謂：「新國民運動乃精神建設與物質建設合一之運動。在精神建設方面，期人人皆能以至誠惻怛，捨身救世之宏誓，在物質建設方面，期人人皆能有勞身焦思，銖積寸累之習慣，而認識新國民運動爲和平反共建國之唯一出路」。本年元旦所發表的運動綱要，又使人感服不止。就時機言，就目的言，這一運動都有其切要，而際此空前重大

時機，尤為難得。此項運動，現已在極適切之方案下付諸實施，願天佑國民政府，蓋若此項運動所期的效果得能完成，則以上所述諸種妨礙國民政府強化發展之原因，亦即一掃而空，國民政府之前途，將頓見光明，而對中日事變之解決，大東亞之建設，當亦有莫大貢獻。本於此種見解，余個人祈禱本運動成功之切，實有倍於他人。余對本運動不欲多言，蓋主席所指示的運動的綱要中，已盡一切。惟為證明余在前項中對妨礙國民政府發展強化之諸項批判，並非誹謗起見，同時為以日本方面一個個人的立場，對汪主席提倡的衷心表示響應與誠意起見，願不辭重覆，略述本人對本運動之若干見解，如能因此而對本運動略盡貢獻棉薄，則又不勝榮幸之至。

(一) 如前所述，國民政府中除汪主席為首的少數例外，不乏對於和平缺少堅決信念者，因此在事情稍不如意時，就有「和平抗日」的論調發見。處在和平運動指導者地位的內部，而竟對和平的信念那樣薄弱，則又焉能使民衆對和平發生絕對的信念？就這一點說來，新國民運動的任務，與其對民衆，不若先對國民政府的關係者強化其對和平的堅決信念。蓋若下自己先有堅決的信念，則無論怎樣宣傳，決不能產生任何表滿結果。

(二) 新國民運動，必須是朝野澈底中日合作，中日親善的運動。

既為響應近衛首相的呼籲，一惜以生命的危險發起並參加和平運動，則就應該考慮澈底的中日合作與中日親善。不過如前所述，少數者依賴英美主義的觀念，現在仍不無存在。余確信中日合作，目前非從協力必勝的信念出發不可，本運動的着眼要點，應該是在朝野間普及與日本協力以完成大東亞戰爭必獲勝利的思想。汪主席所謂不問將來如何與日本共甘，只問現在怎樣與日本共苦的思考，就是這種意味。不過對於協力的內容，現在應有一個明白的指示，而思想澈底化的欠缺，應予糾正。

(三) 新國民運動應是使朝野澈底瞭解日本精神的運動。

中日合作的困難，一部份由於對日本及日本精神缺少充分理解一點，有如此既述。然而，最能表彰所謂東方精神的，却就是日本，這並不是過言。在物質文明上發達極點的英美，現在在大東亞戰爭中已完全失敗，而其原因，不是僅在日本的武力較彼等為優，而是其精神力的優越，這在馬來海戰，瓜哇戰及其他海陸空的決鬥中，已有很好的表現。中日事變以來中國軍隊的勇敢，遠非英美所能企及，然而我們却不能漠視蔣介石氏以日本武士道精神為模範以為部下精神訓練的事實。而武士道精神，正就是日本精神的精華，而我這裏所說的日本精神，亦即指此。我認為國民政府在今後鬥爭中，為擊潰重慶與延安的反對勢力，以獲得最後勝利起見，必須以新國民運動貫徹此種日本精神為急務。

(四)新國民運動必須使朝野澈底具有大公無私與天下為公思想的運動。

中國民族四千年的自私自利的弱點，其為妨礙強化國民政府的原因之一，已如前述。汪主席所說的物質建設，若不清算此利己主義，恐怕終難達到預期的。如真有大公無私的誠意，則為強化國民政府的日本援助，勢必見之積極化，而民心之把握，亦不難獲得所期。

再者，國民政府雖感人材缺乏與人的資源貧困，而又採取門戶封鎖主義，政府成立時日尚淺而已有黨內結黨，派別分歧黨同伐異的現象，均為阻礙國民政府發展強化的因素，亦已見諸前述。然天下究非某一个人的天下，亦非國民黨一黨的天下，故孫總理尙倡導天下為公之說，將天下為公的思想貫徹朝野，實為防止國民政府力量分散並予以鐵的團結的唯一良途。

(五)新國民運動應為實行適材適地主義，人材主義，實行國民總動員的運動。

任何事業，人總是其根本。汪主席對於新國民運動的推進，曾謂第一期是宣傳工作，進而再行第二期等等。余以為一面應以適材適地主義，起用在野人士，使政府的內部陣容一加刷新，余在前面指摘國民政府人材欠缺時，曾謂人材問題不是指過去的閱歷、地位、聲望等言。蓋實際欲担任國民政府目前的艱難革命偉業，與其求諸政府過去中人，不如起用無量數的有為青年。汪主席年輕時，又將介石年輕時，誰又預料到兩氏能言今日？尤其是在亂世時代的今天，一個民族應期待偉大英雄豪傑的來自民間，故此點言，新國民運動尤應該是在民間訪覓賢偉者的運動，是國民總動員的運動。蔣介石氏雖然方向錯誤，情在這裏却是別具隻眼。他一方面展開新生活運動，同時密令部下調去全國人材，以圖加以簡拔。此事確可借鑑。人材是國家之寶，為獲得人材起見，宣傳與訓練，為其必要前提。

(六)新國民運動應該是上意下達，下意上達的運動。

國民政府最高指導者汪主席，因受周圍所蒙蔽，頗不能希獲誠意的忠言之虞，此就汪主席的大政治家資質言，就國民政府的強化發展言，均非得宜。上意下達的方法，也許很多，然下意上達，則困難殊多，新國民運動對於下意上達殆未見考慮，殊為遺憾。惟欲為善政，必須得接近民間輿情，此即余主張新國民運動應為下意上達運動的原因。

四

要之，國民政府是否得以新國民運動一掃從來存在其內部之種種妨礙。其強化發展之原因，而得為中國名實俱在的中央政府，非理論、宣傳或心意的問題，而是在乎實踐。唯有以比重慶延安之抗戰信念更堅決的信念，在日常生活，在平常工作中，以不屈不撓的精神予以實踐，始能完成遠大的目的。抗戰與和平孰是孰非的爭論時代，業已過去。若國民政府諸公能以肉彈的精神推進新國民運動，則國民政府的強化，中日事變的解決，亞細亞的復興解放，均可迎刃而解，幸甚幸甚！

